

◆ 北京市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文丛

美丽中国

与顶层设计

汪天文 王维国◎著

美丽中国的**顶层设计** | 美丽中国的**空间模型** | 美丽中国的**时间规划**

文明的困境 文明的线路

文明的**转向**与制度**决定论**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美丽中国

与顶层设计

汪天文 王维国◎著

北京市政治文明建设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丽中国与顶层设计 / 汪天文, 王维国著. --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150-1332-9

I. ①美… II. ①汪… ②王… III. ①生态文明—建
设—研究—中国 IV. ① X3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2125 号

书 名 美丽中国与顶层设计

作 者 汪天文 王维国

责任编辑 汤中芳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6号 100089)

电 话 (010) 68920640 68929037

编辑部 (010) 6892887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6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50-1332-9

定 价 36.00 元



导 论

在当前，建设美丽中国，是我国社会的时代最强音。美丽中国不但包括了和谐社会的根本内涵，也包括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任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负面的社会问题，如何扭转人与自然之间持续紧张的矛盾关系，如何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得以合理化地配置，如何使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成为区域优势，如何使人们在狭窄的生存空间里获得较大的社会活动效率，如何使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进行社会交往活动和个人精神的培养，这是十分重要的时代课题。

作者以文明发展的历史维度，来看待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的设计等问题，试图建立一个旨在研究、分析、预测社会和谐状态与风险状态的社会解析理论。通过社会时空的复合维度去审视和谐社会的动态结构，具有以下诸多优点：一是有利于历史性地看待城乡关系、城镇和城市群之间制衡与共生的关系，避免孤立、静止、片面地讨论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二是有利于科学地协调一个城市的整体生活节奏，建设和谐社会。通过协调不同城区、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人群的作息时间来提高城市交通功能，缓解能源压力，从而达到降低生活成本、节约管理成本、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实现城市生活的最优化。三是有利于动态描述社会各成员之间交往关系，从生活时间维度去衡量社会成员的生活内容与生活质量，为社会和谐程度提供参考指标。四是有利于从社会和谐运动中呈现出来的节律现象来看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倾向性和周期性问题的，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决策参考。五是有利于从社会空间中挖掘更多的文化内涵。社会空间不仅包括地理

空间，也包含文化空间，具体说还可以细分以下几项内容：以自然环境为制约因素的地理空间，以物质资料为形式的生存空间，以生产、制度、宗教、伦理、家庭等社会关系为线索的文化空间，以语言符号为工具的虚拟空间，以人际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交往空间，以及反映人类生活综合质量的活动自由度。社会空间结构的合理性是一个社会发展潜力和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如社会分层结构、阶级关系、地理空间的大小、生存空间的分配、文化空间的深浅、交往空间的疏密、社会制度的宽容度等，都是社会结构合理性和有序性的指标。

本书兼具理论探讨与应用价值，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全书概貌，现把要点罗列如下：

要点一：透过历史时空，探讨文明的本质内涵与基因缺陷。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文明肇始于技术，技术是文明的真正内核，正是技术，一步一步地使人类从野蛮的洪荒中走出来，走向文明的历史。但是，也正是由于技术，把人类引向未知的不确定的风险的领域。技术的进步是显性的，而道德的进步是隐性的，技术的进步未必带来道德的进步，甚至导致道德的退步。在技术内核的作用下，在人类历史上，进一步先后出现了技术与道德、科学与宗教、经济与环境等三个方面的逻辑背离，这种逻辑背离是人类文明自身的内在矛盾，是一种先天缺陷，注定了当前人类文明的困境。

要点二：梳理文明发展的线索，归纳出世界文明的13个“脚印”，分别代表不同时期文明中心的流转。世界文明中心或科技中心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流转的，这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只要我们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则世界文明中心总有一天会重新回到中国来。人类活动的节奏具有相对稳定的频率，这种频率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加快。当然，人类活动并不是单一整体的机械运动，而是具有多层次的结构。譬如，在政治、

经济、文化这三个领域里，人类活动所表现出的节律就有很大的差异。在经济领域，人们在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表现的积极性最大，活动频率相对较高；在文化领域，人们在从事精神财富和观念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活动频率相对较低，文化的变迁和文化模式的选择具有较大的周期；在政治领域，人们在从事社会管理和矛盾冲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活动频率处于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之间。最后的结论是，文明的发展具有内在的枯荣周期，当前文明遇到的生态问题能否顺利解决，这取决于技术究竟能否自救的问题，而技术的自救又取决于资本运行的规律，而资本的本性是夺取利润，看来环境的恶化在所难免，若无非常措施，人类文明很难扭转颓势。

要点三：深入探讨文明历史发展中存在因果决定性、必然性和规律性，通过分析历史内在的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可以总结历史的发展轨迹。历史上有多种决定论，归纳起来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精神决定论，唯物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神灵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上述几个决定论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发展的一种理论判断和设想，不管哪一种决定论，都难免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种新的理论，以更好地认识和解决眼前人人都不可避免的生态窒息问题，我们呼唤一种文明的转向。根据人类不同发展时期的社会因素，作者概括了三种理论应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在早期社会的萌芽阶段——适用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中期社会的发展阶段——适用社会存在决定论，在当前社会的折转阶段——适用社会制度决定论。其中制度决定论是对社会存在决定论的丰富和发展，即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对立倾向的时候，人与自然的矛盾超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成为决定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重要环节。所以说，制度决定论是应对并解决当前生态文明问题的有效理论，代表着人类自觉描绘的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

要点四：从生态文明的自觉性角度出发，探讨美丽中国的制度设计，以及生态政府的顶层设计等问题。生态文明暗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维度、“文明演进路径”的历史维度、“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维度以及环境治理的技术维度，这反映了人们在生态文明这个问题上的多维认识。由此可以衍生出新的价值体系、新的行为规则乃至新的社会制度。因此，从广义上说，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生态文明就是一种参照自然而立法的制度体系。

作者认为，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三大优势：其一，中国社会具有较为统一的意识形态，高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甚至可以使市场机制得以最高效的运行。意识形态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其他经济制度所无法达到的。其二，中国的经济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大，因此国家有能力界定产权结构，调节社会分配，但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国家机器被资本所绑架，产权结构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其三，中国拥有 30 多年来丰富的改革经验，这种经验之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有很多地方可以借鉴。当然，从学理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就包含生态文明的内涵，或者说，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是内在契合的关系。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才有可能解决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才可以解决资本支配下的人、劳动、技术等方面的异化问题，才可以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问题。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生态社会主义是通往生态文明的捷径。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单靠任何一个地方、一个群体都无法完成，必须举全国之力，才可能完成。只有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方式，才能充分体现生态文明的紧迫性、重要性、系统性、整体性。在中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证生态制度的合理性：制定一整套生态文明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制角度明确方向。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



国家核心战略，经济发展不能背离生态文明的底线。建立科学决策制度，研究生态综合治理的程序、办法以及技术手段，便于统一国家意志，协调各个部门，特别是各级决策者在全局与局部发展的具体决策过程之中，建立高效的环境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具体从产业布局、工业标准、经济结构等规划决策上控制环境问题的产生。设立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平级的生态战略委员会，制定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督促地方政府贯彻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

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一种自觉反省并自发绘制蓝图的一种文明。这为中央政府进行顶层设计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央政府具有顶层设计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即政府集思广益，统一制定生态文明战略，并以重要文件等权威形式贯彻，地方政府结合区情进行低层级的制度再创新，经过中央、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之间的利益权衡，实现生态文明的社会共识和社会习惯。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高度综合的巨系统工程，涉及多领域的协同合作，也关乎多方面的利益分配问题。所以，在制度设计上，就必须确立中央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这不但可以减少利益多方的摩擦与冲突，而且对于出现问题的地方和部门，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责令调整改正，对于部分薄弱区域，还可以调配更多的资源予以帮助。总之，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的政令畅通，统一调配，统一指挥，是十分高效的，因而也是十分必要的。

要点五：在生态文明的逻辑下，参照古代理想国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探讨和谐城镇与和谐城市群的空间模型。在梳理当前城市发展的七个趋势中，归纳并确立当前中国城镇建设中的生态化、智能化、区域化等三个原则。当前是中国城市病高发期，主要症状是交通拥挤，人口密集。鉴于此，作者参照血液循环模型，设计出仿血液循环理想交通模型，该模型仿血液循环原理，不容易堵塞，每一辆车都沿一个方向流动，且在特定的车道内到达目的地，不存在红绿灯等待情况。要实现车辆的

恒常通畅，首先必须尽量减少红绿灯，让每一辆车都在快速路上行驶，其次必须杜绝过境车辆，让所有过境车辆绕道而行，避免车流太大引起的拥堵，再次必须杜绝城市中心化，让所有车辆都只在外围做环形运动。详见第五章相关内容。

仿血液循环理想交通模型虽然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其优点还是十分突出的，主要有：A. 取消红绿灯，减少交通等待时间。B. 所有循环的车流方向一致而有序，提高交通安全系数。C. 闭合快速路或高速路的设计，提高车流通行效率。D. 取消中心区的单元设置，避免城市中心区的拥堵。E. 所有环路内只要一路公交车，按照公交专道绕城环行，提高了公交效率。F. 由于公交的效率很高，公交成为出行的首选，大大降低私家车的出行率。

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内涵，以及当前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总体部署，依照上述的仿血液循环路网模型，作者进一步建立了具体的城市交通模型。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标准城镇交通模型，乃至都市交通模型。

要点六：在城镇布局上，创造一种新的城市空间模型——和谐之城。和谐之城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一个闭合的圆圈，内层为中心空旷区，也是自然生态区；外层为功能单元区，也是住宅工商区。为了避免交通拥挤，城镇中心尽量保持空旷，除了消防中心，其他功能单元一律设置在外围，中心区最好可以规划大面积湖泊或者农田。湖泊有美观宜人、调节气温、调节地下水位、预防干旱、渔业养殖、水上游乐项目等众多功能。而对于耕地面积紧张的地方，可以选择保留原有农田，在这里农田具有生态环保功能，而且对于城市儿童来说具有农耕文明的教育意义功能，同时又可就地部分解决城市农产品消费问题。在外层，十个标准社区可以分列在湖泊或农田周围，其余城市单元就镶嵌其间，其中有大型步行商业区，以及生态工业园，这样的分布不但可以解决宜居环境的生活配套问题，而且有利于当地的经济生产与居民就业问题。每个单元之间用绿

化带隔离，特别是把生态工业园镶嵌在宜居单元之间，可以解决每天的通勤压力，就近上班的基本上可以步行，既节能环保，又锻炼身体。详见第五章相关内容。

要点七：在大力推广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群的布局可以参照以下几点。

（一）四大原则

1. 环境红线：城镇化布局应坚持以不破坏原始森林资源、不影响生态平衡、不减少耕地面积为总的环境原则。

2. 水岸优先：根据水岸经济的原则以及几十年来发展经验，沿海沿江在交通运输方面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可以极大地降低经济初始发展的成本，同时沿海地区可以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沿江地区在水资源的利用方面也相对便利，水岸应该作为城镇化规划的首选地区。

3. 交通先行：对于内陆型地区的城镇化布局而言，交通道桥的建设必须先行。交通先行其意义不言自明，但在前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很多地区走的是传统的老路，即先探索性地发展，在成功的前提下，再来思考交通的拓展问题。

4. 因地制宜：城镇化布局不是一窝蜂地上，而是要根据地理环境的承受力，根据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的总量规模，根据地方经济的传统特色和优势，根据地方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的实际情况，再兼顾宏观格局的需要建立起来。

（二）空间格局

1. 星罗棋布：城市群是星丛，城市群之间的路网是棋局，星丛总是分布在棋局的点上，星丛之间的距离，以及整体星丛的数量和路网的密度，都是一个需要精密计算的参量。理论上说，最佳的情况是到处星丛、遍地路网。但实际情况不可能完全做到如此均衡，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总体上把握星丛的合理布点，既要群星璀璨，又要满天星光，聚集而不拥挤，舒朗而不荒凉。

2. 四道弧线：以沿海经济带的那把“大弯弓”为参照点，东西向左右开弓同时进发。向东，规划更多的滨海城市与海岛城市，规划更多的沿海或海岛工业园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甚至将来可以尝试建立人工海洋城市（即巨型漂浮式城市）。由“弯弓”向西，沿长江、黄河流域逆流而上，逐渐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依次扩散的路线。这样就形成了从东到西的四道城市群密集的经济带弧线：即海岛与海洋城市群、东部沿海城市群、中部城市群、西部城市群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海洋城市的建立与发展，对当前我国发展海洋经济，对当前破解岛链封锁，瓦解国际阴谋具有急迫的现实意义。

3. 五大国门：国门是边疆地区的象征性代表，这里比喻我们要建设固若金汤的边疆经济，在城镇化建设中要优先考虑边疆地区的城市群的规模发展。国门经济的意义十分重大，涵盖经济、社会、军事、外交、文化等诸领域。

（三）区域交通路网

通过中国城市群落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沿海、沿江是城市群的密集区域，也是发达经济带，沿海、沿江的最突出地理优势就是水运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市的交通与运输问题，因而在最大程度上释放了城市的经济动力。从政策层面看，2013年3月份，国家发改委明确了“基本建成42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发展目标和“按照零距离换乘和无缝化衔接的要求全面推进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主要任务。我国交通路网的布局基本上按照地方的经济和人口两个方面的因素进行，区域之间的铁路、高速公路、国道或省道分布形成了一个东密西疏的路网，总体上比较合理，基本上满足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若以仿血液循环交通路网模型作为将来城镇化的交通模型，则只要在区域路网中多设置一些交通枢纽站即可完成从标准城市到区域城市群的完美衔接。

要点八：公共时间规划。公共时间的结构需要由国家政府统一调剂，

由于每项经济活动与非经济活动都需要在空间上发生移动，而人们的移动存在时间限制。因此，有必要研究如何在空间上组织人们的活动系统，使个人生活环境得到改善，这种改善不是单靠增加收入能够实现的。我们要力图通过针对个人行为的线索式研究，总结出不同人群与不同行为系统的匹配，进而更加准确地把握不同类型人群的不同生活需求，为城市规划提供可靠的依据。例如，在工业化的城市里，居民有着极为相似的活动节律，生活节律的整体性具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活动的共时性有利于人们之间的交往，也有利于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但是，消极的一面也是明显的，如在同一个时间里上下班，会给交通带来很大的压力，经常引起潮涌式的交通阻塞，把人们的时间白白浪费在路途当中，这是社会的巨大损失。上下班的时候经常会发生交通拥堵，如果把这一段公共时间分割成几个部分，使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上下班时间交错开，则交通状况将会得到显著改善。具体建议有：

（一）错峰上下班

在标准的和谐城镇内，特殊的环形设计可以避免交通拥堵，但这只是通常意义下的稳恒车流，对于上下班高峰期引发的潮汐车流，依然存在拥挤问题。既然潮汐车流实际上是一种时间性的现象，那么我们也可以从时间维度上考虑解决。首先要明确，跨镇上下班的相对较少，因此潮汐人流和车流基本都在和谐城镇内，只要按不同职业或行业错峰上下班即可。这种错峰的分流，使人流和车流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时间的控制而达到良好的效率。

（二）节假日管理

目前我国在假日管理方面，尚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譬如，由于春节、国庆长假的设置，拉动了旅游经济和休闲经济，但是客观上也造成了潮汐出行现象，给铁路、高速公路、机场和旅游景区带来巨大的短期压力。作者认为，除了春节有特殊性之外，其他长假一律只有一天

的公假，一天的公假是象征意义，与周末双休意义本身不同，因此不必要来回拼凑，增加管理成本。那么，余出来的公假可以拼凑扩展成全国指定的强制性带薪假期，带薪假期每人每年5天，加上头尾双休，实际上每人每年有一次性9天的长假。这样的好处是，一天的公假和周末双休并不一定连接，不会带来大规模的人潮涌动，同时，由于每个人都有9天的带薪长假，必然会在一年某个时间段里出行，但这是随机的出行计划，绝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统一的大迁徙行为。

（三）大春运管理

春运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这既是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综合结果，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情怀。由于春节长假只有7天，人们只能集中在这么短时间内返乡，潮汐现象更加明显。作者认为，要区别对待，首先对于暂住人员，一方面政府号召工矿、建筑、粗加工等企业，在春运期间给农民工春假以更宽的选择项，避免集中放假；另一方面，政府大力推广城镇化建设，让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到城里过年。其次，对于常住人口，特别是在商业、工业部门工作的人员，政府要鼓励春假倒休制度，让错峰过年的人能够得到实际的回报。最后，政府有必要在国人过年的形式上进行艺术性、现代性、科学性的论证，提倡多样化的、健康的过年方式，如旅游过年、多家庭聚餐会过年，和谐城镇里可以尝试建立生日城，平时给所有过生日的人提供专门场所，春节期间就作为过年城等。

要点九：城镇化布局的步骤。目前在国家城镇化规划制定过程中，很多省市自治区都希望自己的区域中心城市纳入城市群规划，已经纳入城市群规划的地区则希望晋升为国家级城市群，于是出现了多地竞逐城市群指标的现象。有的省份担心若没有纳入新的城市群发展规划，今后在经济发展和项目申报中会受到冷落。鉴于目前多地竞逐城市群规划的局面，作者认为，资源总体上是有限的，工作的重点也总是有限的，不

管各地有多大的理由，首先都应该服从大局的利益。根据第五章论及的城镇化建设的环境红线、水岸优先、交通优先、因地制宜的四大原则，可本着先易后难、逐渐铺开的顺序，新一轮的城镇化的规划可以按照以下几个战略步骤进行：

第一步，东部先起。东部三大城市群工业基础雄厚，科技水平较高，人口密度较大，又有濒临沿海优势，可以考虑先起步，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全面提升发展水平，利用其经济优势和区位优势同时带动沿海“大弯弓”经济带城镇化进程，同时培养更多的海滨城市。这样的优点是，东部的基础好，具备“先富起来”的条件和带动作用，同时，沿海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之一，沿海在交通运输方面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可以极大地降低经济初始发展的成本，同时沿海地区可以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所以，在原有三大城市群的基础上继续扩大沿海城镇化，兴建滨海城市，可以节约交通成本，增加出口机会，化解人口压力。

第二步，左右开弓。以沿海“大弯弓”经济带的城镇化为样板，向东发展海洋经济，培养海岛城市，壮大海洋国防能力，形成由舟山群岛、钓鱼岛、台湾列岛、海南岛、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构成的第二道大弧线。一面向东发展的同时，另一面向西则沿黄河、长江、珠江逆流而上，依托中部城市已有的区域城市群，构筑与沿海“大弯弓”经济带平行的城市群，从南到北依次由呼和浩特、石家庄、太原、郑州、武汉、南昌、长沙、南宁构成的第三道大弧线。这样的优点是，海岛城市和海洋经济符合国家的战略部署，并且具有广阔的前景，我国目前在技术上、经济上、人力上都具备大规模发展海岛经济的可能性，并为海洋国防提供强大的后方支援；向西溯流而上，沿江地区在水运交通、水资源的利用方面也相对便利，这种开发顺序也符合经济扩散的规律，先进对落后的帮扶带，既利于产业的转移，也利于资本的扩张。

第三步,五大国门。由整个海岸线构成的第一国门,即沿海“大弯弓”,经济带发展十分良好。陆地上大致可以设置四个国门经济圈,以便加强与邻国的经贸往来。分别是:面向东北亚的以哈尔滨为中心的 second 国门经济圈。面向中亚、中东地区的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第三国门经济圈,面向南亚的以拉萨为中心的第四国门经济圈,面向东南亚国家的以南宁为中心的第五国门经济圈。通过国门经济圈的发展,提高我国边疆地区的经济实力,为腹地的发展打开通畅的大门,通过与周边邻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有利于提高互利合作的睦邻友好的国际关系。

第四步,西部腹地。完成西部地区城市群的选点和布点工作,鉴于西部地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特殊性,可以在城市群以外地区培育区域性中心城市,对于一些城市数量少的地区,应将区位条件好、腹地比较大的县级市培育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或在交通便利,水资源丰富的地区重新规划和谐城镇。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分布广阔,构成了空间规模最大的资源最丰富的第四条大弧线。

要点十:智慧中国,和谐国度。阐述文明变局下的文化变迁,以600年历史时空作为比较尺度,反映东西方文明互相传承的过程。以300年作为比较尺度,反映中西方科技落差,在这300年里,欧洲文化无论物质技术和意识形态都出现了革命性的飞跃,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了世界市场,完善了社会制度。东西方时代落差的强烈对比,以及被动落后挨打的惊醒与自觉,终于在恰当的历史时空下酝酿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运动。这一场意义深远的民族运动,肇始于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主张。改革开放之初曾引起不少非议,3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的真正含义,是把中华民族推向世界潮流中去,只有在世界潮流中,才有机会赢取下一轮的辉煌。要知道,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开放过国门,晚清政府即使开放了一些通商口岸和城市,也是迫于西方坚船利炮的淫威。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在3000



年的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济改革的阶段性成功，推动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领域的全面改革与进步，中华民族第一次自觉、自愿、自主地全方位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的浪潮，迎头追赶世界的潮流。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是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的过程，是农业经济走向商品经济的过程，是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过程，是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社会机械团结走向诸领域有机团结的过程，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当下，在虚拟社会里，城市的最高形式应该是现实空间合理化与信息空间智能化的高度统一，建立智慧城市，是当前城市规划的重要目标。如果说，和谐城镇理想模型是智慧城市的外在要素的话，则物联网和互联网的信息要素就是智慧城市的内在要素。前者是物质内涵，后者是精神内涵。智慧城市是近几年才产生的新生事物，它是网络社会的必然结果，它是一场以透彻感知、互联互通和深入智能等高新技术以及整体智能化管理为引导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是在特定的城市空间下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形式，体现城市经济、市民生活和管理上的整体性的城市智慧。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将成为经济社会主导，智慧城市将成为城市进化的必由之路。智慧城市更有活力，更符合虚拟社会下的发展模式，与传统城市由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推动发展的模式不同，智慧城市的发展更富有创新活力，其经济增长动力不但与劳动、资本、土地要素有关，但主要来自于知识、信息、技术创新等虚拟要素，更多反映了智慧的层面。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理论难题和实际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与困难，作者做了一些创新的尝试。

创新一：提出和谐之城的理想模型，该模型可以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样板。

创新二：提出仿血液循环理想交通模型，解决都市内部和城镇内部

的交通问题。

创新三：提出公共时间规划模型，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生活节奏的和谐。

创新四：提出城镇化发展的次序步骤方案，以应付多地竞争以及财力有限的现状。

创新五：梳理人类文明的枯荣周期及其走向，强调生态文明的唯一性与必然性。

创新六：提出经济短波、文化长波、政治中波概念，用于描述不同领域下人类活动的交往频率与社会节奏现象。

创新七：提出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独特优势，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创新八：提出制度决定论（对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论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在生产力发展到相对高水平的时候，自然矛盾已经超越社会矛盾，成为制约文明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建设真正的生态文明，只有社会主义才是生态文明的最大希望。

当然，问题依然存在，和谐之城及其仿血液循环理想交通模型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目前还没有实践的经验，因此其可靠性和可行性方面尚待观察。